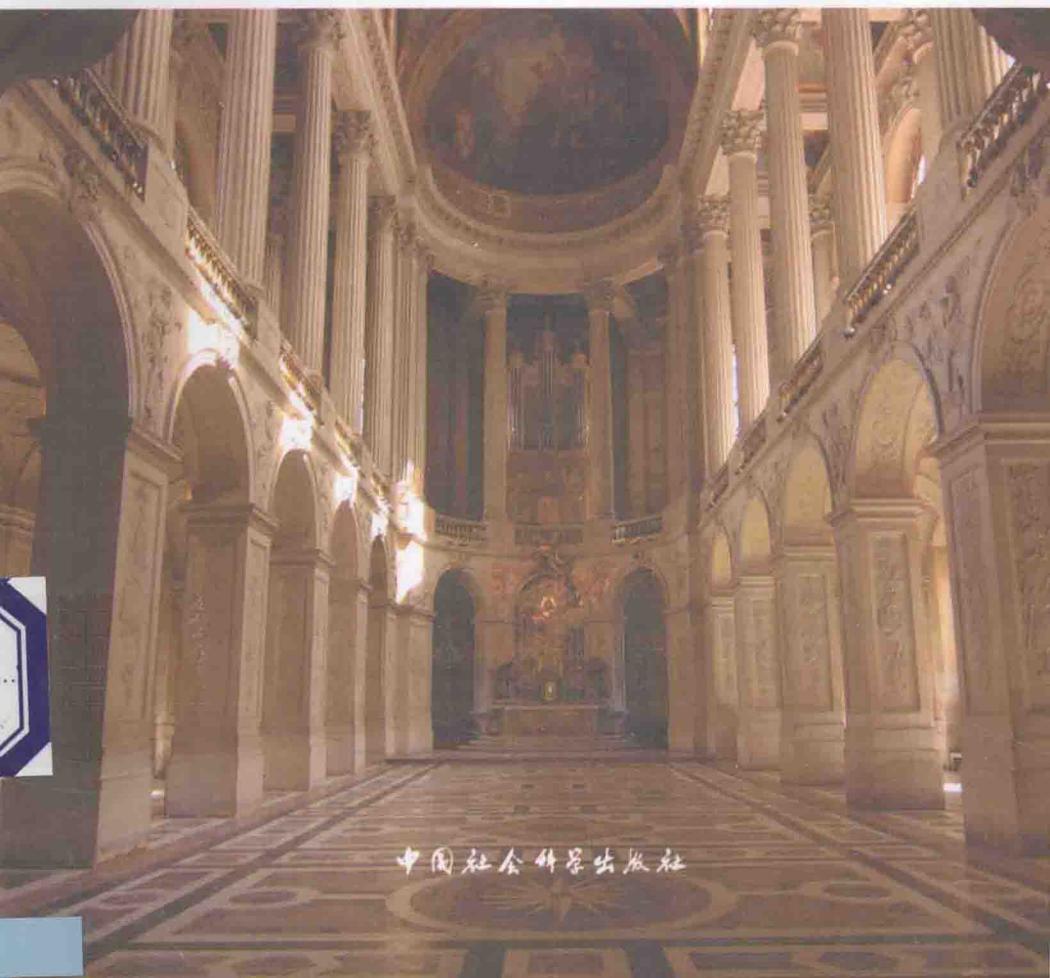


权力的迷宫

—— 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的比较研究

王树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权力的迷宫

—— 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的比较研究

王树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的迷宫：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的比较研究 / 王树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 - 7 - 5161 - 4101 - 4

I. ①权… II. ①王… III. ①权力—理论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65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彪
特邀编辑 李登贵
责任校对 王斐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 :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关系视角的权力思想探险 | (1) |
| 一 | 思想探险的起点:实体主义权力观 | (1) |
| 二 | 思想的帷幕: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的时代 | (9) |
| 三 | 在权力迷宫中相遇——埃利亚斯、布迪厄与 福柯的视域 | (42) |
| 四 | 文献分析:权力思想比较研究的语境 | (47) |
| 五 | 本书的研究内容:关系主义权力观的建构 | (62) |
| 第二章 | 埃利亚斯:相互依赖中的权力超脱 | (65) |
| 一 | 冲破“封闭人”的牢笼 | (66) |
| 二 | 权力:社会构型中的相互依赖 | (70) |
| 三 | 文明的驯化:权力构型中的身体、暴力与性 | (75) |
| 四 | 自我的迷失:权力关系中的自我演化 | (88) |
| 五 | 摆脱权力构型的阴影:固守知识超脱的希望 | (111) |
| 第三章 | 布迪厄:对社会炼金术的象征性颠覆 | (129) |
| 一 | 超越虚假的二元对立 | (130) |
| 二 | 权力与场域:争夺社会世界的主导权 | (136) |
| 三 | 身体:权力与社会神话的记情板 | (144) |

| | |
|------------------------------------|--------------|
| 四 分类图式:社会区隔的内化 | (155) |
| 五 沉默的信念:统治合法性的来源 | (171) |
| 六 象征性颠覆:社会批判与社会解放 | (185) |
| | |
| 第四章 福柯:穿越权力效果史的主体救赎 | (195) |
| 一 历史尘埃中的身体意象 | (196) |
| 二 效果史的底色:权力、历史与话语的纠结 | (210) |
| 三 权力之旅:主体的焦灼 | (226) |
| 四 关心自我、认识自我与生存美学 | (235) |
| 五 解放与自由:主体的自我救赎 | (247) |
| | |
| 第五章 迷宫的构建:关系视角的权力研究范式 | (261) |
| 一 权力研究范式:由实体到关系的问题域建构 | (261) |
| 二 权力概念的关系性诠释 | (265) |
| 三 权力问题域的建构与呈现 | (268) |
| 四 权力、身体、自我与知识/分类图式的概念丛联结 ... | (284) |
| 五 迷失在迷宫中:关系视角权力研究范式的缺陷 | (288) |
| | |
| 结语 穿越权力的迷宫 | (295) |
| 一 理论与现实:双重关系的权力迷宫 | (295) |
| 二 走出关系视角的理论迷宫 | (296) |
| 三 寻找权力迷宫的指南 | (299) |
| 四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就忘记从何处出发 | (310) |
| | |
| 参考文献 | (311) |
| | |
| 后记 | (325) |

第一章

关系视角的权力思想探险

一 思想探险的起点：实体主义权力观

在社会学二百来年的发展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概念及理论议题——权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社会学家的注意力，它向我们馈赠了丰富的理论遗产，也使我们背负沉重的知识负累，而各种各样的认识论障碍也聚集在权力概念及议题的周围，如影随形，使我们无法泰然自若。

（一）权力的面相

权力与社会秩序及社会运行息息相关，也渗透在微观的意义世界与日常生活中。然而，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学者的视野中，权力呈现为不同的面相。马克思将权力与生产资料占有、国家机器、阶级统治联系起来，权力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压迫与剥削的工具；韦伯指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①；而在帕累托看来，“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德]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81 页。

一些人则衰落了”^①，具备精英潜质的人成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精英对国家运转至关重要；对吉登斯来说，权力的运用是所有行动的普遍特征，权力反映出行动者之间的自主与依附关系，凭借作为权力实施中介的资源，即使是臣属者也能对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活动施加影响^②；帕森斯指出，权力是能够为有效的集体行为调动资源的一般化媒介，而阿伦特认为，权力所对应的不仅仅是人们行事的能力，而且是共同行事的能力，必须超出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来考虑权力……^③

从外观上看，思想家们描绘的权力面相丰富多彩，令人迷惑。沃特斯认为，当代社会学的权力理论可以被归并为三种基本立场：新马克思主义或批评结构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是由一个决定国家形态的经济统治阶级所支配的；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由一群经统治阶级认可而统治的政治精英所操纵；功利主义的立场，认为是那些力图实现其利益的个人所导致的冲突与妥协产生了权力结构^④。

高宣扬指出，理论界对权力问题的许多含糊不清的观点，主要来自 17 世纪末以来的古典政治理论的片面权力观，由霍布斯奠定基础的传统古典政治理论，一向把权力看作一种围绕着巩固“主权”而运作的某种统治的强制性和压制性力量的实现；而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有关权力、社会地位和正当性问题的探究，直接

① [意]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77—78 页。

③ 李猛：《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载黄瑞祺主编《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8 页。

④ [澳]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李康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2—233 页。

地影响到当代社会理论对权力和正当化问题的讨论^①。在高宣扬看来，在西方思想史上基本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权力概念系列：第一种类型可称为“非对称关系”的权力概念；第二种类型可称为“权力的集体概念”^②。

李猛描述了权力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两副面相。在众多古典社会学家，作为权力社会学最重要的开创者，韦伯利用“权力”概念指代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特定位置的行动者可以不顾反对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而“支配”则指在特定的群体里，让具体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③。李猛强调，权力与支配这两个概念在韦伯思想中无法消除的暧昧关系为后来的权力社会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调。在韦伯的影响下，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中的权力分析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种是利益—冲突模式，另一种可以称为权威—媒介模式^④。“利益—冲突模式”的核心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基本模式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支配关系。而对“权威—媒介模式”来说，权力与集体而非某个人存在更根本的关系，权力是通过符号化实现的一般化媒介，权力的运作必须建立在合法化的前提下。李猛指出，马克思、韦伯代表第一种权力分析思路，而帕森斯、阿伦特是第二种思路的代表。

高宣扬与李猛的梳理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性：“非对称关系”的权力概念对应“利益—冲突模式”，“权力的集体概念”对应“权威—媒介模式”；他们的梳理勾勒了当代权力理论的基

① 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② 同上书，第157页。

③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81、238页。

④ 李猛：《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载《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第106—111页。

本取向，也揭示出权力理论根深蒂固的视角对立。

（二）实体主义权力观

权力概念在社会理论中呈现出的两种面相并不意味着两种权力研究视角的简单并存，相反却蕴含着在权力研究中被一代又一代社会学家不断构建与坚持的理论对立，体现出韦伯视野中的“权力”一极与“支配”一极的对立。从表面上看，权力理论的许多变体之间存在无法忽视的理论差异，但实际上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蕴含着相似的认识论偏好。

尽管马克思、韦伯、帕累托等人的权力观与帕森斯、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的权力观存在很大差异，但在他们的理论视域内，权力都是可以以明确断言的方式对其外延与内涵加以界定的概念，无论是涉及赤裸裸的强力行使，还是包含着静默的合法性认可，权力都是可以确定的明晰的实体。这些思想家都对权力的本质、权力概念的确定性、权力相对于其他社会要素的独立性保持着兴趣。

与此同时，在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及社会学研究中，许多学者仍在不断进行更为细致的理论梳理与整合，试图提出更具包容性、整合性与普遍性的权力概念，从而超越权力研究的视角对立，化解权力理论的范式差异。对权力存在确定本质及明确边界的坚信、对社会研究的科学性与确定性的追寻成为吸引这些学者进行不懈探索的重要原因。

丹尼斯·朗、史蒂文·卢克斯的研究就体现了学者们的这种探索。尽管朗承认权力与价值和规范存在相关性，承认人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谈论权力，但他的《权力论》一书的主旨仍然是对权力本质的探讨。朗在对韦伯、弗洛伊德、霍布斯、阿伦特、马基雅维里等人的权力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权力看作社会生

活的普遍特征，将权力定义为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认为权力包括有意性、有效性、潜在性、关系的非对称性及权力效果的性质等五方面的内涵^①。《权力论》的英文名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权力：形式、基础与用途》)，蕴含着一种形象的隐喻——权力是一种实体。

卢克斯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社会科学界的权力争论进行了反思。卢克斯批判以达尔为代表的一维权力观和以巴卡拉克、巴拉兹为代表的二维权力观，倡导三维权力观。一维权力观涉及在某种议题——这种议题中存在着可以观察到的（主观的）利益冲突——的决策制定中对行为的关注；而二维权力观对一维权力观以行为为中心的倾向进行了有保留的批评，关注预先防止那些决策接纳各种潜在议题的方式；^② 而三维权力观强调权力研究应该关注的三个问题，即在外显的政治事务决策上的权力运用，影响政治事务决策背后的各种权力因素，支配或者阻碍公民去意识和把握自己真正旨趣的隐伏力量和社会结构性制约。^③ 在卢克斯的梳理中，一维权力观、二维权力观与三维权力观并不是权力的多元面相的简单呈现，而是体现出在“权力是一种实体”的理论预设下，试图以更具包容性、更准确、更科学的理论范式替代旧有范式的“无限逼近真理”的尝试。

吊诡的是，尽管学者们可以像朗和卢克斯那样构建出越来越精致、细微的权力概念，但对权力研究的总体发展而言，学者们

^①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② [美]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12 页。

^③ 同上书，第 13—18 页。

一直在做的其实只是不断地生产和建构与权力相关的话语与想象，它们都围绕“权力是一种实体”、围绕一种特定的谈论权力的方式而展开，权力的本质、边界和独立性是受关注的重点。

(三) 突破权力研究的认识论障碍

然而，权力问题并未变得更加明晰，并未因看似更具科学性、包容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权力概念的不断提出而变得简单，由权力及权力概念引发的理论争论并没有得到消弭，相反却变得越来越复杂。

高宣扬、卢克斯向我们列举了当代社会理论围绕权力问题展开的争论^①：权力是属性还是关系？是能力还是能力的运用？权力如何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它们的运作是否存在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可能？权力同象征性符号体系、意义系统，同语言、知识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是什么？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的权力斗争采取什么样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们对政治及整个社会领域的权力斗争发生怎样的影响？与此同时，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权威概念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权威的定义是协议性的还是共识性的？权威是否是强制性的？权威的贯彻是指向信念、指向行为，还是指向两者？权威是对自由的否定还是自由得以贯彻的一个条件？权威同人性、社会、文化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权威同政治统治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是什么？

卢克斯对权力概念引发争论的原因及化解这种争论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在卢克斯看来，权力是多义词，权力意味着各种不具

^① 参见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上），第157—158页；〔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31页。文中提及的卢克斯的观点转引自沃特斯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从行文的表述可以看出，高宣扬对当代社会理论围绕“权力”与“权威”概念发生的争论的表述明显地受到卢克斯的影响。

有唯一的共同本质并且除了其名称相同外不存在任何共同特性的目标或对象，权力概念存在于不同的地方性语言游戏中。我们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背景下并且是在无穷无尽的不同方式中使用权力这个词；人们并不是就各种事实进行争论，而是就应当如何描述这些事实的特性进行争论。^① 卢克斯指出，权力概念可能来源于我们想要描述与阐释的内容，并且被其塑造；权力也可能影响和塑造我们想要描述和阐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概念与方法上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问题；卢克斯相信一种可能，即“权力”意味着一种“在本质上可争论的”事物，那些在道德与政治上存在分歧的具有理性的人们可能会就事实达成一致，但是，他们不会就权力存在于何处的问题达成一致。^②

卢克斯的策略是在描绘了权力争论的性质后，跳出“权力”概念的语言学陷阱，在承认权力争论的政治意涵的前提下，对如火如荼的权力争论采取回避，转而以确定的、可检验的方式固守在三维权力观的阵营中。在卢克斯的视野中，权力仍然是一个实体的概念。卢克斯描述了问题，但由于认识论局限产生的盲点效应，他没有从新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以推进权力研究的进展。被卢克斯抛弃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权力论争的政治意涵，而是一种对关系的警醒。

面对如此众多的争论纠缠在一起所形成的理论迷雾，卢克斯坚定地消解与绕过了它。值得追问的是，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发现权力这一实体的本质，还缺乏足够准确、科学与全面的权力概念吗？认真审视以上争论我们

^① [美] 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第 53—54 页。

^② 同上书，第 54 页。

会发现，在高宣扬与卢克斯提出的这些问题中，权力并不主要以实体的形式而存在，并没有简单地呈现为对权力是什么的本质性追寻；与此相反，在这些问题中，权力更多地体现为理论要素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张力。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谈论权力的方式。

李猛在批判“利益一冲突模式”、“权威一媒介模式”的传统权力观的基础上，挖掘了福柯权力理论的价值。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多形态的，而不是同质的；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某些人或者集体的所有物；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不应仅仅从宏观着眼考察权力，还应充分考虑权力的微观运作；权力与反抗密不可分。^① 福柯将权力看作一种关系策略，但更重要的是福柯强调要在权力与身体、知识、技术等其他社会要素的密切关联中探讨权力。

福柯启示我们继续追问，权力在社会学思考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面临着怎样的认识论障碍，应该以何种方式谈论权力？破解权力研究困局的指南到底在哪里？是继续寻找权力本质的堂吉诃德式的知识冒险，还是对权力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新的尝试？

在这种追问中，在对西方社会思想史的梳理中，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相遇了。特定的时代孕育了特定的思想家，时代为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在权力研究上呈现出的洞见与睿智提供了可能。让我们走入他们的时代，去梳理他们的人生与知识轨迹。

^① 李猛：《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载《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第114—121页。

二 思想的帷幕：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的时代

（一）对时代危机的回应

社会思想史梳理的目的不是为了泛起幽暗的思想涟漪，而是阐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埃利亚斯、福柯还是布迪厄，都不是在抽象的时空中、以纯思辨与纯方法论革新的方式谈论权力；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历史及社会的变迁使权力运作的基础与机制发生了改变，也为权力研究范式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对埃利亚斯而言，自 1871 年统一以来，德国几经沉浮，强国的民族梦想、一战爆发、魏玛民主在暴力崇尚面前不堪一击、二战中的纳粹大屠杀、战后的德国复苏与国家分裂、20 世纪 60 年代西德社会围绕忏悔和罪感发生的代际冲突，构成了埃利亚斯思想发展的场景。尽管埃利亚斯的人生几乎横跨整个 20 世纪，但其思想的基调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基本定型。在其晚年，埃利亚斯默默地审视着时代的巨变验证或质疑他青年时代的洞见。终其一生，埃利亚斯始终陷于一种双重身份的冲突与危机中，尽管他常常低估这其中蕴含的张力：他既是德国人、又是犹太人。^①

青年埃利亚斯曾参加犹太复国运动组织蓝白协会，并担任布雷斯劳^②小组负责人，但他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绍科尔采指

^① 参见 Norbert Elias, *Reflection on a Life*, Cambridge, U. K. : Polity Press, 1994, pp. 6 – 13。

^② 布雷斯劳（Breslau），原属德国，埃利亚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青年时代。二战后布雷斯劳被划入波兰，改称弗罗茨瓦夫（Wroclaw）。

出，20世纪初犹太青年的复国主义运动与德国青年运动^①在起源上紧密相连，犹如基督教青年运动旨在打破强加给基督教的孱弱娇气的形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的也在于打破关于犹太人的相似的刻板印象，在犹太人中推进体育教育的发展，特别是田径、拳击、游泳和滑雪^②。德国青年运动内部潜在着同性恋的倾向以及对于男性形体美的高度尊崇^③。尽管蓝白运动与犹太复国主义关系密切，但蓝白运动在政治上或宗教上并没有完全认同、也没有传播“危险的”犹太异端的声音；蓝白运动不仅受到德国青年运动“天真冒进”特征的影响，还受到整个德国文化的熏陶；蓝白运动的目标不是让犹太青年简单地返回犹太人的传统，而是力图在同化日耳曼修养的基础上实现文化与精神的提升

① 德国青年运动从19世纪末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覆灭。19世纪末至一战爆发是青年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体现出浓厚的反现代性倾向，崇尚回归自然，通过在德国乡土中远足，锻炼青年的意志与独立性、培养同志精神，抵制现代性对生命和灵魂的损害；一战爆发至魏玛共和国是青年运动的第二阶段，德国在一战中战败使早期青年运动的浪漫色彩受到打击，但无私奉献、同志精神、战斗情谊却经历了战争的考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运动出现了强调结盟与符号化的审美表征等倾向，更体现出极端的政治化走向，领袖崇拜也成为这一时期青年运动的主要特征；纳粹上台后，以极权高压手段作为后盾，通过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强行统一与改造了青年运动，使其成为纳粹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浪漫主义、自然与抗议、青年崇拜、民族、领袖原则、社会主义是德国青年运动最重要的理念。参见曹卫东、黄金城《德国青年运动》，载曹卫东主编《德国学术第一辑：德国青年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7页。

② [匈]阿尔帕德·绍科尔采：《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凌鹏、纪莺莺、哈光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③ 德国青年运动的早期领导人物古斯塔夫·维内肯主编的杂志《源起》曾探讨并支持手淫、同性恋、男性形体美等为传统道德所质疑的话题及行为。维内肯对包括埃利亚斯在内的早期青年运动的活跃分子影响很大。绍科尔采指出，已有研究表明，终身未婚的埃利亚斯具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同样也很受女性欢迎，实际上拥有双性情欲生活。同上书，第13—14、16页。

与发展^①。崇拜强者、歌颂暴力、渴望新生是一战前后德国青年（包括许多犹太青年）普遍的精神气质。

在论及 20 世纪初德国的社会思潮时，斯特龙伯格指出，“就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些年，德国掀起了一场青年运动，其狂热的理想主义随后注入了战争。青年运动的候鸟们起来反对他们的长辈。他们满脑子尼采式思想：在启示录式暴力的伴随下实现彻底的精神更新。”^②

与绍科尔采将埃利亚斯的这段人生经历看作时代精神气质的显现相比，乔登（Gordon）的解读带有浓厚的批判意味。在 1921 年与朋友的通信中，埃利亚斯写道，犹太人“出身低微”、已成为“没有骨气、令人怀疑、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人群”；蓝白协会的任务就是将犹太人转化为有文化的公民，将德意志人民的品质传递给犹太人：只有当犹太人被深度德国化后，才能成为一名出身犹太的公民^③。在蓝白协会早期的运动纲领中，这种转变主要通过学习德国艺术及在大自然中远足等方式来完成，而从 1922 年开始，运动的重点由美学转向政治组织，从教育转向纪律^④。怀着对埃利亚斯的明显质疑^⑤，乔登得出如下结论，尽管不能说

① [匈] 阿尔帕德·绍科尔采：《反思性历史社会学》，第 15 页。

② [美]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0 页。

③ Daniel Gordon, “The Canonization of Norbert Elias in Franc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0, No. 1, Spring 2002, p. 78.

④ Ibid., pp. 78 – 79.

⑤ 乔登（Gordon）认为，法国学术界对埃利亚斯的接受存在误区，主要表现为忽视了埃利亚斯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德国右翼青年运动的关系，忽视了埃利亚斯思想中内的社会进化论及目的论色彩，埃利亚斯对法国社会与德国社会的对比研究与事实不符，带有亲德、反法的倾向。就像文章的标题 *The Canonization of Norbert Elias in France: A Critical Perspective*（《诺伯特·埃利亚斯在法国封圣：一种批判的视角》）所揭示的那样，乔登（Gordon）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破除埃利亚斯在法国学术界的神话与神圣化。

蓝白协会的意识形态与纳粹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但蓝白协会存在着亲法西斯倾向；由于历史资料匮乏，我们无法断定埃利亚斯是否会赞成蓝白协会所有的亲法西斯意识形态，但可以确定的一个判断是：“埃利亚斯的思想包括了来自德国右翼的某些陈腐的观点。”^①

绍科尔采和乔登对埃利亚斯早期人生经历的分析，为研究埃利亚斯与犹太复国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的关系及埃利亚斯社会学思想中隐而不彰的张力提供了切入点，对了解埃利亚斯在 *The Germans*（《德国人》）^② 中描绘的魏玛时代的社会构型、社会思潮及犹太知识分子的思想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尽管埃利亚斯对这段经历避而不谈，但他从未对这一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困境掉以轻心。从坚信文明进程必将使人类学会控制暴力的冲动^③到关注暴力在文明社会爆发的可能性^④，进而到对德国人及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幻想的分析，研究主题的变化与衔接反映了埃利亚斯试图化解个人经历及学术思想困境的理论突围。

与埃利亚斯相比，布迪厄面对着另一场社会变迁：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社会开始向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转型，文化、教育、消费、生活方式等社会领域发生

^① Daniel Gordon, “The Canonization of Norbert Elias in Franc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0, No. 1, Spring 2002, pp. 79 – 80.

^② 参见 Norbert Elias, *The Germans : Power Strugg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abitu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ambridge, U. K. : Polity Press, 1997。

^③ 参见〔德〕诺贝尔·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一卷 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王佩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二卷 社会变迁 文明论纲）》，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④ 参见 Norbert Elias, *The Germans: Power Strugg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abitu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